

北京天主教東堂與中葡文化交流

吳豔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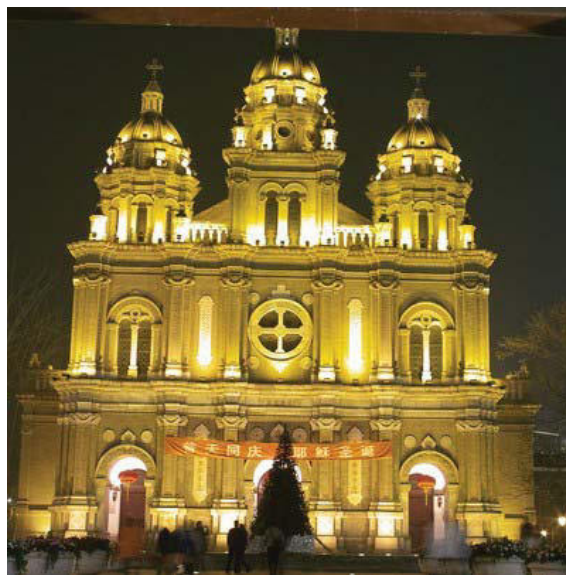
1655年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和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 (Louis Buglio) 在北京創建了天主教東堂。自此，東堂成為北京葡萄牙傳教士的主要傳教基地。他們在這裡培養了許多葡萄牙傳教士，並且開展各種科技、文化活動。可以說，東堂即是中葡文化交流的見證，又是中葡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為是時葡萄牙傳教士得以在中國繼續打開傳教局面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東堂的盛衰興廢

1648年，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和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 (Louis Buglio) 來到北京。因之前在張獻忠政權擔任偽職的關係，為安全起見，他們先在肅王府當差，後又供職於光祿寺固山佟國綱家。到北京後，他們一方面寵辱不驚、完全忘我地投入到北京地區的傳教事業，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利瑪竇傳教時採用的上層路線，即利用自己深居宮苑的條件對滿洲上層貴族傳教，並獲得了成功。“兩神父在京傳教，數年以後，教友漸多。”⁽¹⁾ 後來，安文思和利類思在京的事蹟逐漸傳入皇宮，受湯若望影響極大的順治帝在湯若望的請求下，於1655年恢復了他們的自由，時在順治十二年。據利類思〈安文思傳略〉：

他們在京城一直住了七年才為皇帝所知。但當皇帝知道他們的身份後，以極大的善意對待他們，賜給他們一所房屋、一座教堂、薪俸及金錢。⁽²⁾

事實上，教堂並非順治帝直接所賜。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六：“皇上賜給房宅一所（原註：或即建堂之處），銀米若干。”⁽³⁾ 另據安、



利二神父的上書：“賜銀米養贍，房屋度修。”⁽⁴⁾ 即是說，安、利二神父是在順治帝所賜房屋基礎上，由肅王側福晉 Simon 之母 Justa Tchao 與一位宗室出資修建一座教堂。⁽⁵⁾ 這裡提到的宗室很可能是指佟家。另據魯日滿的記錄，安文思修建教堂還曾獲鄭芝龍的幫助：

（鄭芝龍）一到京城，此時，正好有兩個我會的宗教人士安文思和利類思來到京城。（……）尼古勞（鄭芝龍的教名）對二人特

* 吳豔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編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別尊敬、友善，親自登門拜訪他們。他眼看二人一貧如洗，首先給他們安排了一個住處，還在裡面為他們建妥一座教堂。最後，還友善慷慨地為他們配備了僕人和一切用具。⁽⁶⁾

此教堂供奉中國主保神聖人若瑟，故名聖若瑟，即後之東堂。關於1655年安、利二神父修建東堂的情況，中外資料均未見報導。葡萄牙學者巴斯多（João Basto）提到東堂時稱：“這座禮拜堂祇知道是愛奧尼亞建築風格，是供奉聖約瑟的。”⁽⁷⁾ 但安文思所建之東堂於1720年北京地震倒塌，後則由奧籍教士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神父用葡王德立克三世的贈款，主持重建，於1721年落成。重建後的東堂是十分壯觀的歐式教堂，堂有“自鳴鐘樓”，樓下有“日晷石一雙”，還有一三層樓的觀星臺，內置各種西洋儀器，⁽⁸⁾ 堂內還有郎士寧所繪壁畫，當時人稱：“此堂置於羅馬，亦無愧色。”⁽⁹⁾

嘉慶登基後，因不喜西士，所以在嘉慶年間，“得進京效力者，止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繼，接續無人，致西士漸絕跡於京師，而京師教，遂至日衰落，有一敗塗地之勢。”⁽¹⁰⁾ 嘉慶十二年（1807），在東堂的西教士，想把他們所保留下來的珍貴書籍藏在比較妥善的地方。因怕白

日搬運會引人注目，東堂傳教士選擇夜間偷偷運走，但因不小心將燈火傾倒在書箱上，引起了火災。除該堂四壁外，所有房屋全被燒燬。當時東堂在欽天監任職的福文高 (Domigos Joaquim Ferreira)、李拱辰 (José Nunes Ribeiro) 二位神父，立即上書引咎，自請處分；同時希望嘉慶帝“按乾隆四十年南堂火焚，帝賜銀萬兩，敕工部重建前例，也賜銀重建”。⁽¹¹⁾ 但嘉慶非但拒絕了他們的請求，還令福、李二神父移居南堂，將東堂房院沒收。大堂原本沒有燒燬的地方，也下令拆除，後將東堂堂基賜給了一位大臣。這樣，東堂自安文思建立到被毀，共有一百五十九年的歷史。⁽¹²⁾

東堂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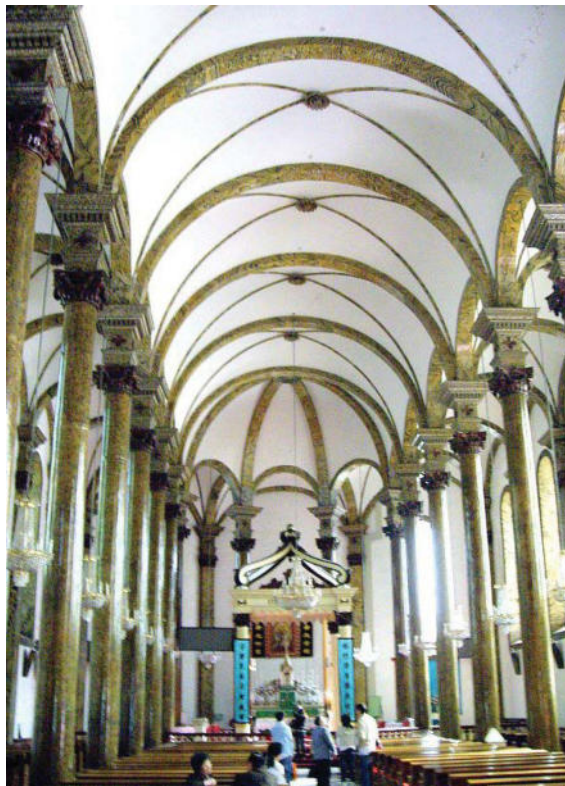
一、便利於清宮葡萄牙傳教士開展教務活動

自東堂建成以後，進京傳教或為清廷提供各種服務的葡萄牙傳教士，都被安置於東堂之中，這樣他們有了安身立命之處，不再顛沛流離。東堂從建成到被毀，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傳教基地。

早在東堂建成之初，安文思、利類思便以此為根據地積極宣教。他們同時管轄京師及近畿地區的教務。在二位神父的努力下，該地區的傳教形勢一片良好：

當時正定府有教區七所，保定府二所，河間府一所，山中一所。此外諸城中有駐所十四處，數處各有教堂一所，其他村鎮尚未計焉。一六六三年京師受洗者五百人，近畿受洗者千人。次年受洗者七百人。⁽¹³⁾

後來，雍正雖然嚴厲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但他並不排斥所有的傳教士。一方面是因為“懼人議其不能繼承先志”，另一方面，他知道中國的天文觀測、曆法修訂等活動離開西洋傳教士是不行的。“故雖京外各省之西洋人，盡行驅逐，而在京之西洋人，於行教立堂諸事，仍聽其自便，一遵先朝成規。”⁽¹⁴⁾ 為了達到充分利用他們



的目的，雍正帝對身懷絕技而又“慎守法度”的西洋傳教士恩寵有加，顯現出其溫和寬容的一面：

雍正因為需要西教士為他效力，所以對他們相當優容，不但讓他們擁有四座教堂，可以在裡邊祈禱舉祭，而且北京的教友們也可以進堂祈禱行聖事。⁽¹⁵⁾

雍正十一年 (1733)， “東南二堂尚有神父十一人，修士五人”。⁽¹⁶⁾ 例如，雍正年間仇教事件發生時，葡萄牙傳教士高嘉樂 (Charles de Rezende) 被召到北京治理曆算。他以在東堂治理曆算為掩護，一如繼往地進行傳教活動，“僅居治理曆數之名，仍在京師及近畿傳教如故”。⁽¹⁷⁾ 雍正帝對西洋傳教士才能和技藝的依賴使宮中的葡籍傳教士“屢禁不止”，而東堂的存在則是葡萄牙傳教士香火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

乾隆帝雖也實行過禁教，但祇不過是為了繼



承先輩遺志。他本人對傳教士並沒有太大的惡感。乾隆帝對為他服務的傳教士們表示出的極大友善和敬愛解除了東堂神父們的後顧之憂。所以，“自乾隆十年以後，西洋神父亦能照常傳教，北京三堂瞻禮日，鳴鐘集眾，教友濟濟登堂，神父宣講聖道，一如平日，六部大員，近在咫尺，皆熟視若無睹也。據當時神父記載，乾隆時，京都與近畿，及關東口外，教友不下四萬，每年成丁領洗者，足有千人之譜曲”。⁽¹⁸⁾

嘉慶前期，東堂及其他教堂傳教士還在堂口組織教友來管理教堂和舉行各種儀式：

天主堂共有南北東西四堂（……）盧姓、尤姓、劉姓，並讓黃旗漢軍馬甲周炳德，現在各堂誦經講道，管理一切傳教事宜。又於嘉慶七年間，將海甸、孫家井地方舊有西洋人寓所

一處，改為聖母堂，分為男女兩堂（……）各講經傳教，每月男女來堂念經，煽惑甚眾。⁽¹⁹⁾

可見，當時東堂組織的宗教活動井然有序。

二、便利於對在華葡萄牙傳教士進行培訓工作

為了提高在華葡萄牙傳教士的整體素質，葡萄牙方面主要採取了兩種方式：一種是從國內直接派遣各種人才；一種是在所到之處創辦學校。他們在北京創辦的培養傳教士的學校主要是於1784年在東堂創辦的聖若瑟學院。

1784年，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a）主教曾在澳門創立了聖若瑟修院，託葡萄牙遣使會神父管理。聖若瑟修院先為教區修院，後成為遣使會的總修院，收納我國各地的修士。薛瑪竇神父曾由西灣子遣八名修士到這個修院，孟主教初年，也派遣修士到澳門聖若瑟修院，“後因路途

迢遠，諸多不便，乃在蒙古建了一座修院，後遷至南家莊，由此遷至北京”。⁽²⁰⁾

這就是東堂聖若瑟學院的由來。1784年9月9日，花利亞和拉撒路·費雷依拉（Lázaro Ferreira）去湯士選曾居住過的學院執行王室關於建立神學院的命令。在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學院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因為後者更為合適並且耗資少。⁽²¹⁾不過，聖若瑟學院成立之初，經費也十分緊張。⁽²²⁾就在這一天，聖若瑟學院設立了北京天主教神學院，⁽²³⁾專門培養、訓練葡萄牙傳教士，以滿足他們在中國傳教區的需要。1784年10月1日神學院重開，有八名學生，神學院由拉撒路教士負責管理，自果阿拉撒路來的曼努埃爾·科雷亞·瓦倫特（Manuel Correia Valente）神父擔任神學院院長。⁽²⁴⁾這樣，一直到1853年若澤·若阿金·佩雷拉·米蘭達去逝，聖若瑟神學院在中國培養了許多的葡萄牙傳教士。此外，東堂在重建以後，還曾經創辦了教育中國子女的學校。⁽²⁵⁾但東堂的主要培養對象仍然是葡萄牙傳教士。

由於當時交通極其不便利，再加上路途遙遠，被派往中國的教士最後能順利到達中國的畢竟是少數，派遣傳教士的費用也很高。而在目的地創辦培養神職人員的學校的方法則剛好能夠彌補這些缺點。這種方法既節省了費用，也可以使傳教士們能夠進行連續性的學習，其影響較直接派遣傳教士來說，也更為深遠。當時的東堂為了給傳教士的學習提供方便，還建立了自己的圖書館。不過，“東堂的圖書館比南堂晚五十年，而且其重要性也未超過南堂。那裡從未超過兩三個神父，也沒有成為一所學院，祇是南堂的屬堂，其圖書館為南堂服務，實際上由南堂控制”。⁽²⁶⁾另一方面，除了擔負起培養葡萄牙傳教士的任務外，東堂還是在華葡萄牙傳教士的聯絡點和避難的場所。當教難發生時，他們會到東堂中尋求庇護，以至於當時有人說東堂是葡萄牙傳教士“藏汙納穢”的場所。

三、便利於清宮葡萄牙傳教士從事科技文化活動

利用西洋奇器的進獻，吸引中國統治階層及

上流社會人士的注意，並滿足這一部分人的奢侈心與好奇心，從而推動天主教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是明後期利瑪竇以來制定的天主教傳教路線的最重要方策之一。東堂傳教士安文思也是利瑪竇路線的積極推行者。他多才多藝，不僅懂得天文學、算學，還精通機械製造技術。安文思在東堂為康熙帝製作一個自鳴鐘，“每小時自鳴一次，鐘鳴後繼以樂聲，每時樂聲不同，樂止後繼以槍聲，遠處可聞”。⁽²⁷⁾他還為康熙造一自行人，“像內置機械，右手執劍，左手執盾，能自動自行，互十五分鐘不惜”。⁽²⁸⁾這些西洋奇器的製造使清朝統治者對傳教士越來越青睞，進而對天主教在華傳播也更加寬容。

東堂傳教士還從事許多文化活動，尤為突出的是翻譯、著述了大量書籍。其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宣傳天主教教義、教理；（二）介紹中西方文化。

（一）宣傳天主教教義、教理。時因教皇已經批准在華傳教士用中文獻祭、實行聖事，所以，東堂的傳教士將許多重要的教義、教理書翻譯成中文，並刊刻發行。他們希望將這些理論知識與具體的傳教活動聯繫起來，使信徒們對天主教教義認識更為深入，從而使天主教在華傳播的範圍更加廣泛。康熙年間，利類思所撰此類書籍頗多，主要有：《超性學要》三十卷，當時的歐洲人稱此書為“群言之折衷，諸理之正鵠”；⁽²⁹⁾《彌撒經典》五卷；《七聖事禮典》一卷；《司鐸課典》一卷等。同時期的安文思也注重用佈道和文字使靈魂皈依。目前所見安文思這一期間的天主教教理著作僅兩種，一是《超性學要》神學簡編兩卷；一是翻譯聖多瑪斯的《復活論》兩卷。⁽³⁰⁾到後來，東堂傳教士們刊行的教理書在民間流傳十分廣泛，有的教理書甚至再版印行。教友的數量也隨教理書的廣泛流傳而日益增多。這些教理書在漫長的禁教時期，無疑給受難的教友們帶來了很多安慰與鼓勵。

（二）介紹中西方文化。東堂傳教士長期生活在中國，因而寫了很多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最

具代表性的是安文思。安文思所寫的最重要的一部介紹中國的書籍是《中國新史》。它重點記述了明末清初的歷史和社會狀況。這部書在早期漢學研究領域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開了歐洲人研究中國地方誌的先例，且有較強的學術性。第二部是《中國、韃靼皇帝駕崩及繼位簡記》。安文思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揭露了關於順治帝駕崩和康熙帝繼位的一些內幕。安文思記載：“這位中國和韃靼的大君主（順治）駕崩了。（……）2月5日，傳出皇帝得了天花，當天下令整個京城內不許出售雞、醋、醬和酒，勿在路上潑水、撒灰。”⁽³¹⁾他的這份有確切日期的報告和中文文獻相互印證，使我們對康熙繼位的問題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另外，還有《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關於1664年後的教難情況》等。

在介紹西方文化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利類思。1668年，康熙帝向利類思、安文思和南懷仁三人詢問有關西洋風土人情，三人遂合撰《西方要紀》。它“專記西洋國土、風俗、人物、土產及海程遠近”⁽³²⁾。利類思還專門翻譯了兩本介紹西方動物學知識的書籍。1678年葡萄牙使臣來華時，向康熙帝獻上一頭中國人從未見過的獅子。當時，人們很好奇，“多有問其相貌、性情如何”⁽³³⁾。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利類思翻譯了《獅子說》。後來，康熙帝又向他詢問“西土西國馴養鷹鷂之法”⁽³⁴⁾，於是，他又將西方一部關於鷹的名著翻譯成為《進呈鷹說》。這些西方風物、動物學等知識的譯介，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使他們對於西方的情況開始有了一個初步的瞭解。

從東堂的盛衰興廢以及葡萄牙傳教士對東堂的充分利用可以看出，東堂與葡萄牙傳教士始終是一種非常和諧的、互利互惠的關係。在東堂初建時，葡萄牙傳教士傾注了很多心血；東堂被毀時，葡萄牙傳教士盡力挽救。葡萄牙傳教士對東堂的深情可見一斑。另一方面，東堂也為葡萄牙傳教士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葡萄牙傳教士依托東堂，發展了大批信徒，而且培養了許多葡萄牙傳教士，提高了葡萄牙傳教士的整體文化素質。他

們還在那裡製造各種西洋奇器，著述、翻譯大量書籍，中西方文化在這裡得到交匯與融合。可以說，正是有了類似於東堂與葡萄牙傳教士之間融洽的關係，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才能最終形成。

【註】

- (1)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55。
- (2) (意) 利類思著，何高濟譯：《安文思傳略》，《中國新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頁184。
- (3)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55。
- (4) (清) 黃伯祿著：《正教奉褒》，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第一冊，頁1487。
- (5)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41。
- (6) (比) 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1659年至1666年中華帝國政治及傳教狀況記》，里斯本，1672年，頁23。譯文轉自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頁275。
- (7) (葡) 巴斯多：〈17世紀葡國為建造北京兩座最早的耶穌會教堂所做的貢獻〉，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期，頁29-33。
- (8) (朝鮮) 洪大容：《湛軒燕記》之〈東天主堂〉，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刊行《燕行錄選集》(上卷)，1960年，頁231-430。《湛軒燕記》成書於1765年，故知洪大容所見東堂當為費隱主持重建後的東堂。另參見黃時鑒〈朝鮮燕行錄所記北京天主堂〉，《東西交流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05-424。
- (9)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頁619。
- (10)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222。
- (11) (12) 張澤著《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2年，頁160。
- (13)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257。
- (14)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202。
- (15) (16) 張澤著：《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頁29。
- (17)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491。
- (18)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214。
- (19) 張澤著《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頁146。
- (20) 羅光：〈遣使會在華傳教史〉，《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臺北：光啟出版社，1967年，頁155。
- (21) (22) (23) (24)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183。
- (25) (法) 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熙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士》，頁137。
- (26) (法) 惠澤霖著 李保華譯：《北堂圖書館史略》，《北京檔案史料》，1998年第2期，頁70。
- (27) (28) (29)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258；頁257；頁244。
- (30) (意) 利類思著，何高濟譯：《安文思傳略》，《中國新史》，頁184。
- (31) 金國平、吳志良：〈耶穌會傳教士安文思手稿所記順治晏駕與康熙繼位〉，未刊稿。
- (32) (清) 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卷78，史部地理類存目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80。
- (3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86。
- (34)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246。